



温州大学
WENZHOU UNIVERSITY
党史党建研究系列丛书

文化、资本与道德

温州道德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

方德志 孙武安 等著

道

德

文化

“以利和义”

揭示“千年商港·幸福温州”
的道德文化发展脉络和道德动因机制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WEN ZHOU

方德志

安徽舒城人，哲学博士，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现为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瓯江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比较与转化创新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青年基金等项目，在《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共情、关爱与正义：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孙武安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主任、浙江省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思政课影响力提名人物。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同时，承担多项省部教学研究项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教学科研论文百余篇，已出版著作、教材等十余部。

“新时代温州道德文化建设创新研究团队”研究成果

文化、资本与道德： 温州道德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

方德志 孙武安 等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资本与道德:温州道德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 /
方德志等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1

ISBN 978-7-5178-5246-9

I. ①文… II. ①方… III. ①道德建设—研究—温州
IV. ①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229872号

文化、资本与道德:温州道德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

WENHUA.ZIBEN YU DAODE: WENZHO DAODE WENHUA JIANSHE YU FAZHAN YANJIU

方德志 孙武安 等著

责任编辑 唐红
责任校对 何小玲
封面设计 望宸文化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93千
版 印 次 2023年1月第1版 202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5246-9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和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温州传统道德文化的生成、特征及影响

第一节 永嘉学派与“以利和义”的道德文化传统 / 28

第二节 温州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特征 / 36

第三节 温州传统道德文化的当代影响 / 47

第二章 温州革命道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温州革命道德文化 / 59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温州革命道德文化 / 70

第三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温州革命道德文化 / 83

第四节 从永嘉学派事功精神到温州革命精神再到温州人创业精神 / 93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温州道德文化建设

第一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温州的兴起 / 105

第二节 温州道德榜样与公民道德建设 / 111

第三节 温州产品质量与城乡文明建设 / 132

第四节 温州社会慈善与志愿服务建设 / 161

第四章 新时代温州道德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 第一节 传承中国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道德文化 / 177
- 第二节 推进国有企业守正创新与非公企业党建 / 185
- 第三节 彰显温州工匠精神,促进文明水平整体提升 / 199
- 第四节 新时代温州人精神与温州道德文化自信 / 204

第五章 温州道德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发任务

- 第一节 温州道德文化建设的经验特征 / 223
- 第二节 新征程下温州道德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 231
- 第三节 新征程下温州道德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 240

附 录 / 252

- 附一:《温州社会道德建设事业发展研究》结题报告节选(2013年) / 252
- 附二:“温州社会道德建设和发展现状研究”系列调查问卷(2013年) / 271

参考文献 / 280

后 记 / 290

绪 论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以创新闻名,也将以创新继续探路。创新,既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社会环境,也需要人们在道德文化层面的精神驱动。“温州模式”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温州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创新的结果,是温州人创新精神的表现。“温州模式”形成背后的道德文化创新动因,主要体现为温州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工商业社会背景下温州民营“资本”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三大动力要素之间的有效嵌入和互动。

不忘来时路,续写创新史。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先后23次到温州考察调研,并殷切“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总结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也为全国作示范”^①。新征程下,如何继续发挥和探索推进温州道德文化创新动因诸要素之间的合理张力关系和价值合力,发挥温州道德文化软实力对温州经济和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事关温州“两个健康、共同富裕、重要窗口”等战略建设目标的有效推进。

从现代意义上讲,道德是一种引导人们正当行动的社会规范,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和追求权益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约定俗成性。道德文化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仪式的特征描述,反映了当地人们基于特定价值追求而形成规范、履行规范的总体行为特征。道德文化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最能代表或展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深层文化心理特征。精神文明建设是道德文化发展的环节,也是一个地

^① 胡剑谨主编:《续写创新史:温州改革开放40年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方道德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现。在国家稳定与世界和平的环境下,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一样,都是可以通过政府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建设方式被发展出来的。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道德文化得以扩充、更新和发展,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认同心理和文化自觉或自信觉悟。

道德主要是通过风俗习惯、社会舆论、个人德行修养等途径来引导和规约人们的日常行为,发挥着调节人际权益和个人身心健康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成长环境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心理、道德仪式也会发生变化。作为人的精神活动体现,人的道德活动方式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先进的、开放的道德观念或信念和道德态度会促进人的实践自信和实践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保守的道德观念或信念和道德态度会抑制人的实践创新和自信,进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效果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发展。

一、温州道德文化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概观

温州道德文化,是温州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谋求权益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反映了温州人民在调节人际权益和获得个人身心健康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特征。温州道德文化源远流长,其基本价值取向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永嘉学派所主张的“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永嘉学派“以利和义”的道德事功思想,主要是讲要通过“以利促义”“寓义于利”的道德思维路径来实现“社会道义”,拒斥空谈个体心性道义。这一思想主张既展现了温州人民在与恶劣的温州地理、历史环境做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勤于实践、精于思考、善于团结、事功求效”的道德文化心理品质,也反映了汉代以来儒家正统“重义轻利”思想与南宋时期温州实际相结合的一种道德义理创新,即注重从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来阐释儒家的心性道德义理。就此而言,永嘉学派主张“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体现了对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问题的道德关心,在当时具有人性解放和社会平权的启蒙意义,反映出南宋时期市民生活和商品活动的活跃。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道德文化面临解构的命运,温州传统道德文化也面临解构和新的发展。1876年,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进一步促进了温州社会道德观念的变革。在此过程中,温州知识分子一方面以“强国富民”为目标导向,通过提倡实业、办学、留学等方式学习和传播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观念,力图改善温州人民的贫苦生活;另一方面,则以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来比对和诠释西方工商业文明背后的道德义理,着力促进人们的道德观念变革。这为后来温州人的世界行商意识、卓越工匠精神、现代道德文化心理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历史条件。当然,这一过程也是西方工商业文明、宗教和道德文化与温州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过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道德文化发展内容主要围绕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展开,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阶层等因素的剧烈变化,各种社会道德思潮激荡起伏,人的精神家园四处漂泊,没有一种道德文化能够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道德愿望和中华民族道德的前进方向。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进而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站在社会劳苦大众的立场,强调通过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式摧毁腐朽的、剥削阶级的道德文化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思想精髓,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为根本指导,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道德文化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新型道德文化,反映了中国最广大穷苦人民的道德愿望和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型道德文化特别强调,要用坚决的革命斗志去克服传统道德文化中那种软弱无能、毒化意志的道德妄想,强调道德文化发展要为人的现实生活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强调要通过社会实践和实干的方式来实化道德理念,反对空谈道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新型道德文化与永嘉学派所主张的“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之间有着精神义理上的相通性,中国共产党在温州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历程,也为温州人的精神淬炼和思想升华提供了重要历史条

件。换言之,古代温州恶劣的地理、历史环境孕育了温州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在近现代再经过革命战争烈火的淬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后,温州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富有拼搏进取、自强不息的革命气质。例如,温独支(中国共产党温州独立支部)成立之后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发动工农运动、红十三军建立之后与反动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共浙江省一大在平阳召开等,这些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都充分体现了温州人民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革命斗争精神和信念坚定、勇于奉献的集体主义道德情怀。所以,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之后,在商品经济的竞争浪潮中,温州人率先探路,勇往直前,处处表现出敢为人先的精神气概,创造出了“温州模式”,为中国探索实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先行经验。这些无疑是艰苦卓绝的温州革命道德精神与“以利和义”传统道德事功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实践情境中精神叠加、优化发展的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有计划、分阶段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务,依次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温州道德文化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成效,也是在党和国家有计划、分阶段的道德建设进程中逐渐取得的,基于温州传统道德文化涵养的温州模式、温州人精神也是在此过程中显现出来的。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成为我国第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试验区,也是我国1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随着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新形势下温州道德文化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走向开始受到各界关注。1986年12月9日至14日,浙江省社科联与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在温州市联合举办了“温州试验区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央书记处、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联、文汇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各省区市和院校等的130多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大家对当时温州道德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等问题都做了热烈讨论和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在此背景下,温州市结合当时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逐步开展了道德榜样、质量兴市、公益慈善、文明城市、美丽乡村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经过30多年的创建积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温州

取得了巨大成效,温州道德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也获得了整体提升,成为之后温州及浙江走向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精神动力和重要内容之一。

提升产品质量是人类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最重要的道德标志。现代温州道德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就是从提升温州产品质量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久,少数温州商人因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极大地损害了温州商人和温州产品的市场形象。为改变这一不利局面,1994年,温州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实施“质量立市”战略,第一个颁布了《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拉开全面打假治劣、名牌兴业、信用建设、品牌强市的大幕,从严从实抓温州产品质量建设。同时,温州人固有的卓越道德事功精神也促使温州商人进行理性反思和行为纠正,他们通过聘请专家、引进技术、股份合作等方式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逐步改善了社会声誉,赢得了市场。温州民间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温州市实施“质量立市、质量兴市、质量强市和信用温州”等办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短短20年时间里,温州产生了许多知名品牌,拥有38个中国品牌、58个驰名商标、42张国字号产业基地“金名片”。2014年12月,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现场验收组对温州质量创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温州做法”在全国具有借鉴和示范意义。“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产品质量提升基础上,温州道德文化发展有了根本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温州公益慈善、文明城市、美丽乡村等建设活动逐步开展起来。

产品和服务质量是对人的道德品质的试金石。温州质量和品牌建设过程,也是温州人现代道德品质的培育过程。产品质量提升了温州人的品牌保护意识和市场规则意识,也逐渐培育出温州人的工匠精神。温州工匠精神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深刻地形塑和改造了温州人和新温州人的现代道德心理结构,提升了温州人民的整体道德素养,也倒逼了温州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的改革,产生了“即办制”“最多跑一次”等提升行政效能的改革举措,提升了政府的公德水平。

温州人的工匠精神,是当代浙江人工匠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业文明和工业制造业发展的一种缩影。它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结构转变和由农民向市民的社会身份转变。“温州制造”也是“浙江制造”和“中国制造”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一个重要环节。道德都在行动之中,道德都在作品之中,道德欺诈与道德诚实之间的历史博弈最终都会定型于作品实物之中。温州产品和温州人的工匠精神既体现了温州人的一种“做工”精神,也反映了温州人的一种“精细”思维,它很大程度上是永嘉学派“以利和义”卓越的道德事功精神的当代显现。

厚德才能载物,薄德无以久立。民间的厚德土壤是支撑温州精神文明建设的力量源泉,民间微善力量的持久发力是温州道德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这些都得益于温州人民在与恶劣的自然、历史环境之长期较量过程中养成的一种勤劳勇敢、坚韧自强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品质使温州人民在自立、自强、自足的同时又有乐善好施的品质倾向。善施在于有盈余,盈余在于有劳作,其根本在于人们能自立、自强、自足。改革开放,为温州人民勤劳勇敢、坚韧自强的道德品质转化为现实成果提供了社会条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红日亭”为地标的温州民间微善力量持续发展,是温州民间厚德土壤长期持存的历史见证,它为温州慈善总会、企业家基金会的各种慈善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社会道德土壤。

人民群众对道德建设的理解和拥护往往是朴素的,通常是与经济实惠联系在一起。道德建设只有深入群众,改善群众生活,才会获得巨大的社会效应。经济建设只有真正受惠于民,才能激发人民的道德激情。道德冷漠一定程度上在于人们心寒,在于缺乏道德激情,在于人们因为过度依赖他人同情而招致的心理失落和情感收敛。所以,道德建设首先在于经济建设,在于惠及人民的日常生活。道德教育首先在于培育德行品质,在于培养人们自立、自强、自足的道德文化心理,防止人们产生依赖同情、抱怨社会的道德心理。总之,没有温州人民的根本生活改善,没有民间微善力量作为厚德土壤,没有产品质量作为物质保障,温州道德文化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很难获得持久动力和目前的成效。

21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和“八八战略”指引下,温州市主要以“三生融合·幸福温州”为理念目标,积极推动温州城乡综合改革和平衡发展,加大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城乡文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综合治理水平和工业制造水平,极大地改善了温州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使温州以往的自然环境劣势变成了温州社会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优势,“绿水青山”成了温州人民的“金山银山”,温州人民的公共道德素养、生活幸福感指数都有了整体提

升。2014年,温州市首次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2017年、2020年又分别蝉联这一荣誉称号。2016年,温州市11个乡镇(街道)获评“浙江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乡镇”,30个村成为“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且2014年以来,温州4个乡镇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温州城乡平衡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也极大地提升了温州人民的生活幸福感。2021年,温州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也是温州连续3年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并位列2021年地级市榜单榜首。温州市鹿城区还上榜“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城区)”,瑞安市、乐清市也荣获“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县级市)”,等等。一个地区人们幸福感的提升是该地区道德水平整体提升的重要体现。没有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没有安全感做保障,没有适宜的生活、生产、生态环境,人们很难真正体会到幸福感。温州人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反映了温州道德文化厚积薄发的发展成效,它是温州政府与温州人民共同努力和长期投入的结果,也是“幸福中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等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在温州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温州市结合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文化的发掘和传播,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发挥党史教育在多方面的思想教育辐射功能,增强了温州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道德体认、对温州及浙江地区建设“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自信。在此过程中,温州市一方面弘扬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文化对温州道德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铸魂意义;另一方面,积极发掘以永嘉学派“以利和义”思想为代表的温州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义理的现实转化,有力地推动了“两个结合”问题在温州的探索和实践。

二、温州道德文化发展的道德义理和动力机制特征

(一)温州道德文化发展的道德义理特征

永嘉学派所主张的“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构成了温州道德文化发展的道德义理源头,但在经历近现代中国革命烈火淬炼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

洗礼之后，“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已经得到了时代更新和精神扩充。“以利和义”思想蕴含了关于人的行为动机及其与效果相统一的道德评价原则或道德义理逻辑。

“以利和义”主要是讲要通过发展社会功利或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式来兑现和承载社会道义，拒斥空谈心性道义。这个“利”一般指社会整体之功利，也可指个体自我之功利。这个“义”是指社会道义，含有“正义”“义务”“责任”的意思，它一般表示个人对他人或社会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或义务，也可表示个人对自己所肩负的道德责任或义务。概言之，“以利和义”主要讲我们对他人或社会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或义务一定要体现和落实在“利益”的供给效果上，防止“利薄而义空”。

但是，永嘉学派“以利和义”的观点并不蕴含在实现自我功利与促进他人或社会功利之间的价值冲突，它在价值排序上仍然坚守儒家正统“义先于利”的道德动机论，反对人们为了个人私利而损害他人或社会整体之功利。只是不同于朱熹等人注重“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观道德动机论，永嘉学派更强调从道德效果来谈论社会道义，坚持一种“以利和义”的道德效果论。所以，永嘉学派“以利和义”的道德事功思想体现了对人的行为动机及其效果评价的内在统一，体现了永嘉学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关注。

朱熹等人遵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义先于利”的道德观，就提升个人主观心性修养而言，并无妨碍。但是，一旦回到社会现实，面对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身份差异、文化差异、贫富差异、运气遭遇等复杂因素，人们则很难再按照纯粹主观心性动机而行动。而且，人们越是在主观心性层面谈论社会道义，越容易患主观道德心理优越症，越容易固化道德等级观念和抵制外界事实的侵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一种主观道德心理优越症的体现。治愈这种主观道德心理优越症，就是要在现实世界创造平等的生活条件，以让人们都能吃上相同的食物、住上相同的房子、用上相同的交通、接受相同的教育，平等享有共同的“人欲”，在平等共享的“人欲”中显现“天理”。由此，人们在现实世界享有平等、同样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了特殊的优越感，这个时候人们的道德心理才会走向平和，才不会产生“存天理，灭人欲”二元对立的等级思维观念。

总之，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儒家正统“义先

于利”的道德动机论,在个人心性层面也主张反对以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来增加个人私利;另一方面,又转化和发展了儒家正统“义先于利”的思想,提出了“以利和义”思想,主张通过人的外在实践用功、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等方式来承载和实现社会道义,防止人们止于主观心性空谈道义。这是永嘉之学更注重道德成效和关注现实民生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一点,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民族危亡,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阐扬。

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涵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及其基于人民立场的道德事功精神,后者也涵摄和推动了前者在当代的转化和发展。所以,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对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在关于个人主观道德动机的评价方面,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就体现了对儒家和永嘉学派等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所持守的“义先于利”道德义理的传承和发展;^①而在关于人的道德动机及其社会功效的评价方面,我们则注重从改善人民生活和增进社会整体功利角度来评判社会道义(或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可以说体现了对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义理的传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指导下,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思路。而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中,我们党评判一项制度、政策的社会道义(或精神文明建设)程度,主要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或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先行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发展关系和建设成效提供了先行经验,其中就离不开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的潜在影响。进言之,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义理一定程度上已经演进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发展关系。物质文明是

①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是既含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主张的基于解放人类之目的利他性道德文化基因,也含有源于儒家、永嘉学派等所主张的“义先于利”之整体主义的道德文化基因。这两类道德文化基因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指引着中国人民的个人主观道德动机始终能朝向一种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价值取向。

精神文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社会功利也是实现社会道义的条件和基础。同样,物质文明发展的程度,也体现了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要求,正如“以利和义”体现了“利”对“义”的基础性地位和“义”对“利”的引导性作用。^①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道德文化的发展特征也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及其基于人民价值立场的道德事功精神与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之间的义理融合,进一步体现了关于人的行为动机与其效果内在统一的评价原则。我们知道,温州(及浙江大部分)地区自古以来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温州人民养成了一种求真务实、注重实践、关注民生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则是这种区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体现了温州人民在面对恶劣的、复杂的生存环境时被激发出的、逐渐养成的实践创新能力和实践成效意识。而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也是强调要根据人的社会实践成效来评判人的认识正确性与否。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这里,人的“实践”不是抽象的、观念意义上的“实践”,而是人们面对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之复杂性问题解决“实践”,是人们破解现实难题的“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蕴含了实践成效性评价维度。缺乏对实践的效果性评价维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就不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改造世界的“实践”,只能是止于观念意义上的“实践”。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主张“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并在

① 其实,如果一种精神文明建设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种精神文明的建设方向或价值取向就可能出了问题。这种精神文明建设实质上也是类似于一种个人主观玄想的道德体现,因为它只看重人的内在道德动机而忽视该道德动机所依据的外在(自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和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完成三大产业改造之后不久,推行“一大二公”的思想主张。从个人主观道德动机来看,“一大二公”的思想动机是好的,它是要彰显每一个人的集体主义道德动机,但是从道德成效来看,当时推行“一大二公”思想主张并没有真正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甚至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后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经验和教训,破除个人主观道德想象,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的指导地位,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拨正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发展关系,将个人心中信奉的共产主义社会道义(动机评判)切实转化为一种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德效果(效果评判),由此逐渐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当然,当时倡导和践行“一大二公”的思想主张,反映了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有所不足。

G20杭州峰会期间将“浙江精神”概括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里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就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观。

“干在实处”中的“干”字强调了人们应该具有实践的态度和动机,而不该只有坐而论道、说而不做的态度;“实处”强调的是“干”的具体问题指向和实际效果产出,即面对现实情境中各种复杂问题的解决办法、解决程度和所产生的效果。只有“干”的态度和动机,没有面向现实难题之解决办法和实际成效,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实践”,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科学认知。共产党人的“实践”态度若不能转化和生成成为一种破解现实难题的办法和产生实际的效果,就不可能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实践”,就不可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情境和民族的历史处境。一个人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只有“干在实处”,才能锻炼出一种更好的、更强的应对复杂问题之解决的能力、毅力、斗志、信念、信心,才有可能“走在前列”。^①一个人如此,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所以,从道德评价机制或道德义理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观蕴含了对人的行为动机及其效果相统一的评价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温州地区推行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与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之间的义理融合,^②有效地促进了“两个结合”问题在温州的探索和实践,从中也孕育出了一种迎难而上、勇于“改造世界”的“温州人精神”。

(二)温州道德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道德力量异常活跃。产生这种道德现象的诱因也非常复杂;但是总体观之,我们认为,“文化”“资本”“道德”三要素之间的内在互动构成了其主要动因。

^① 方德志:《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的丰富和发展》,《温州日报》2022年8月15日第5版。

^②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区除了展现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与温州永嘉学派“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之间的义理融合,还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与王阳明“知行合一”道德事功思想、永康学派“义利并举”道德事功思想等为代表的浙江传统历史文化之间的义理融合。这个过程也同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与以浙江历史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间的义理融合,从中也孕育出了以“浙江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特质。